

进口贸易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思想史的考察*

邵 军 司增绰

摘 要：经济学围绕进口贸易开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比较优势理论一经提出，李斯特、穆勒等学者就指出斯密、李嘉图站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立场具有局限性。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众多学者指出落后经济体要开启现代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在现代产业领域的新比较优势，实施进口限制和贸易保护具有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分别从内生技术进步及生产率提升的角度，就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观点相异的各学说流派并非相互否定的关系，发展阶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围绕进口贸易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讨论，如果不考虑发展阶段的具体因素，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关键词：进口开放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工业革命以后，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后发经济体在赶超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与工业化进程相同步的是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开放条件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必然要涉及确定贸易政策导向的问题，即到底是实施自由贸易，还是对进口加以限制。经济学已经对贸易自由化的收益进行了充分阐释，贸易促进专业化分工并通过交换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这在教科书中被列为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然而观察经济史不难发现，自由贸易并非常态，围绕贸易政策的争论事实上贯

[作者简介] 邵军，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1189，电子信箱：shaojunseu@163.com；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21116，电子信箱：szc-xz@163.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批准号：20ZDA0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扩大进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及对策研究”（批准号：18AZD008）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穿经济思想史。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政策实践来看，围绕是贸易开放还是贸易保护的争论，构成了交替主导的两条主线。近三十年以来，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这背后的论据与斯密时代已存在很大不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主动扩大进口，进口开放的广度、深度及便利度得到显著提升。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全面梳理和认识进口开放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对充分理解当前阶段贸易政策构建的理论依据、准确把握贸易政策演进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从斯密到马克思

产业转型升级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产业结构由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为主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体的结构性转变，以及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国际贸易，而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以及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拓展的更具一般性的比较优势理论，它们的核心政策主张都是贸易自由化，鼓励专业化分工以实现生产力提升及国民财富增加。斯密和李嘉图在论述过程中并未专门讨论产业结构调整，但其分析推论就是，贸易自由化将推动产业结构专业化于比较优势部门。上述研究的时代背景是英国率先开启并完成工业革命，贸易自由化将巩固英国在工业领域的比较优势，符合英国的利益。但对于落后的后发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则意味着专业化于原材料、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调整与经济现代化方向相背离。关于如何促进本国所期望的但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李嘉图未做论述，但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略施笔墨。斯密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对国外输入货物的进口限制，相当于某些产业取得了或几乎取得了独占权，“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使社会在那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财转用到这方面来”（斯密，1974：24）。进一步地，“由于有了这种管制，特定制造业有时能比没有此种管制时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过了一些时候，能在国内以同样

低廉或更低廉的费用制造这特定商品”（斯密，1974：29）。可以看出，斯密对进口保护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围绕贸易政策的争论贯穿整个经济思想史，经济决策背后往往存在很多复杂的制约因素，而这是难以简单依靠某种理论来获得解决方案的。不过，斯密也提出，“使本来不纳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产业转到这个方向来”，“这个人人为的方向是否比自然的方向更有利于社会，却不能确定”（斯密，1974：25）。进口限制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向特定方向调整，但这种调整是否优于自然进化，则全然未知。

比较优势理论构成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基石，但李嘉图的相关政策主张同样引起了广泛争议，其中最为著名的批判者就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1961：118）指出了斯密及李嘉图相关理论的缺陷：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论证了自由贸易带来财富增加，但“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提出，工业对于国家财富的创造具有重大意义，自由贸易只会使落后农业国专业于农产品的生产，却无法获得工业发展的生产力。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有可能使落后农业国丧失发展生产力的机会而被固化在产业低端。基于当时英国已经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在经济上遥遥领先于大陆国家的现实，李斯特（1961：128）认为，“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不可能”，而建立并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就是施加关税，限制特定产业的进口。“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李斯特将李嘉图的静态分析拓展到了动态维度，比较优势并非固有特性，而是个别经济体的先行优势，从后发者的角度看，不应受困于先行经济体所确定的比较优势格局及分工模式，而应借助于必要的贸易保护，来促进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李斯特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发展阶段的不同将是决定贸易政策导向的重要因素，李斯特的理论也被称为幼稚产业保护论。但李斯特（1961：265）也指出关税保护应是有选择的：“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当允许免税，或只征收极轻的进口税，直到在机器生产上能与最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时为止。在某种意义上说来，

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对外国机器输入征收关税，实际上就是限制国内工业的发展。”这些主张也在现代产业政策实践中得到了普遍认同与应用。

李斯特与李嘉图理论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看待比较优势的时间属性，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而李斯特则是将比较优势看作动态因素。另一位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表达出了与李斯特相似的观点。在其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也发现了比较优势的问题：比较优势是否与生俱来？显然并非如此！“在某一生产领域中，一个国家之所以优于另一个国家，往往只是因为这个国家起步较早，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固有的优势或者劣势，有的只是率先获得的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穆勒，2009：813—814）。穆勒（2009：813—814）指出，在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英国工业的竞争下，后发经济体的新兴工业部门很难发展起来。“唯有在一种情况下保护性关税才是正当的，即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发展初期的年轻的国家）为了将某种外国产业移植到本国使之更加适合本国的情况时所征收的临时性关税”，“在合理的一段时间内征收保护性关税，是国家支持进行这种试验的最为有利的方法”。对于发展初期的后发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不对称的竞争优势下，贸易保护是实现产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穆勒（2009：814）特别强调，“只有在可以肯定被扶持的产业接受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可以独立地参与竞争的条件下，国家才应该提供这种保护”，同时不要让国内生产者指望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经过必要的公平考验时间之后继续依靠保护主义。这在现代经济学中被称为幼稚产业判定与选择的穆勒标准，同时也反映出穆勒与李斯特在贸易保护目的上略有差异：在穆勒看来，进口限制重在给某些产业一定时间以弥补其后发劣势，最终还是要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参与自由贸易；在李斯特看来，贸易保护及关税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工业体系。

围绕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进行了相应论述。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从英国废除《谷物法》入手，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好处，继而展开了对自由贸易思想的批评。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不过是把资本的剥削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规模再现出来，只能使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然而从社会革命及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马克思（1972：209）指出：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

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还是表达了“革命意义上”对自由贸易的赞成。恩格斯（1965：424）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中对马克思在演说中的观点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以致生产力与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自由贸易是“能最快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这个死胡同的办法”。

马克思对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制度都进行了批评，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对于自由贸易或者关税保护都加以辩证看待。关于关税保护制度，马克思（1963：835）指出，保护性关税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英国等西欧经济体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就是得益于保护关税制度。恩格斯（1965：427）进一步阐述：“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对还在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有用，而且也可以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新兴资本家阶级有好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促进社会变革的思维角度出发，支持处于后发阶段的经济体实施进口限制与贸易保护，他们认为这是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建立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助推器。借用现代经济学语言，两人同样认为贸易保护能够发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也附带着可能的成本，恩格斯（1965：427）特别强调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保护性关税制度会带来三个难题：一是“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护起来……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二是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无论确定公平的税率是多么困难，但怎么也没有转过来实行自由贸易的困难大”；三是保护关税制度会造成垄断，一旦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托拉斯，就表明保护关税制度的任务已经由防御外国进口商转变为防御国内消费者。客观而言，这些问题在进口保护政策的现代实践中都得到了验证。

归纳来看,古典经济学者围绕贸易政策的争论,焦点在于比较优势的时间属性,核心在于各种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问题。李斯特强调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属性,指出后发经济体应实行贸易保护促进工业发展及比较优势的形成,即比较优势是可以制造出来的。直观来看,这与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简单比较是存在视角偏差的。身处发达经济体的斯密和李嘉图讨论的是贸易利得的问题,而居于落后农业国的李斯特讨论的更多是发展的问题,这种争论并非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挑战或否定,更多则是各理论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争论。李斯特或穆勒所强调的是,通过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创造出产业发展所需条件,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制造出比较优势,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格局。但李斯特和穆勒都未否定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一旦工业部门发展得以实现,他们还是认同自由贸易的价值所在的。李斯特(1961:105)强调“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穆勒强调征收关税的临时性,最终目的还是要参与自由贸易。对于进口保护所带来的成本,李斯特和穆勒同样有清晰说明,而恩格斯对保护成本的讨论就更为深刻了。古典经济学存在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在于各种理论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问题。

二、发展经济学的进展:现代幼稚产业论

19世纪后半期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转变,效率及均衡分析成为研究焦点,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及相关政策的讨论逐渐淡出。进入20世纪后,二战成为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重大历史节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迅速解体,大量新获独立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寻求迈向经济现代化。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启工业化进程。二战后,以工业化为核心议题的发展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重新激发了对贸易问题的讨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起步尤为困难:一方面,“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产力是低的”,从农村转过来的劳动大军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能,公用的、相互支持的网络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克服工业初创时期的无知,缺乏富有经验的企业家、对于创业风险的惧怕,这些都使工业无法起步

(刘易斯, 1983: 428—431)。他还指出, 技术革新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出口产品进入欠发达经济体时, 就会破坏与之竞争的本地工业, 例如 19 世纪来自英国的廉价进口货打击了印度原本十分发达的手工业。上述问题“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 19 世纪时大得多, 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去做决定, 工业化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 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 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刘易斯, 1983: 429、432)。因此, 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采用限制进口竞争的保护性措施来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推进工业化进程。

理论层面上, 现代幼稚产业保护论的重要贡献是基于动态学习效应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即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 通过学习效应能够逐渐培养起与国外产业竞争的能力。现代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特别强调了实施贸易保护的三个必要条件: 受保护的特定产业具有技术外部经济特性; 保护期有限; 保护能够帮助产业实现足够的成本降低, 以使产业发展初期的大量投资能够获得与其他投资途径一样的回报率。第一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指, 如果不存在技术外部性, 即企业只能够从自己的过去经验中学习, 其过去的经验也无法对其他企业形成外溢效应, 这种情况下产业的发展完全依靠私人市场就可以了, 产业保护的理并不成立。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指, 只对幼稚期的产业施加保护以促进其成长, 经过幼稚期保护的产业应该能够形成竞争力, 保护不应被延长至成熟, 甚至衰退期产业。第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确保产业保护所获得的收益能够覆盖政策实施的成本。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判别与选择幼稚产业的三个标准, 即肯普标准 (Kemp's test)、穆勒标准 (Mill's test) 和巴斯塔布尔标准 (Bastable's test)。此外, 现代幼稚产业保护论还重点讨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存在技术外部性及动态学习效应的情况下, Corden (1971) 认为最优的政策工具应是生产补贴, 关税会导致消费扭曲, 优先度应次于补贴, 优先度最低的工具是进口配额, 因为配额既无法产生关税收入, 配额的分配也更有可能产生寻租行为。Corden (1974) 进一步指出, 如果产业发展滞后是由市场失灵所致, 最优政策工具就不是贸易保护。例如, 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那么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应是最优政策工具, 而非保护性政策 (Flam and

Staiger, 1991: 96—117; Bond, 1993: 191—212; Grossman and Horn, 1988)。

相较于古典时期的定性逻辑推导,现代计量经济学以及数据统计工作的发展,使得学界能够对幼稚产业保护论进行经验评估。一些文献从经济史的角度,基于历史上的贸易保护政策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作为曾经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加拿大等都在19世纪采取过进口限制政策来保护国内新兴产业。Head (1994)以19世纪后期美国钢轨产业为例,综合分析了干中学、资源禀赋改变和关税保护等因素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效应。Head (1994)基于估计出的需求和成本参数,对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产出及福利状况进行了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关税保护下美国钢轨产业表现出很强的学习效应,总体上关税的福利效应为正。Irwin (2000)以美国的马口铁产业为例,探讨了进口限制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马口铁在制造业中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是工业化进程初期重要的通用型产品。19世纪初英国是世界马口铁的主要供应商,美国的马口铁产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在1890年关税法案实施对马口铁产业的关税保护以后,美国马口铁产业开始繁荣起来。Irwin (2000)采用概率分析模型及反事实模拟的方法考察了这种进口限制是否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结果显示,如果是在没有进口限制的情况下,美国马口铁产业的发展将会较受到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延迟约十年时间。

理查德·哈里斯 (Richard Harris) 等就19世纪后期加拿大“国家方针”(national policy)政策对于制造业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Harris, Keay, and Lewis, 2015)。“国家方针”是加拿大政府于1879年通过的政策体系,目的是推动加拿大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主要举措就是对制造业实施关税保护以及推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加拿大“国家方针”政策是对当时美国提出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的回应,后者的核心就是强调高关税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哈里斯等以“国家方针”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处理效应及倍差分析等方法,考察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否发挥了实际效果,结果显示1879年以后接受了高关税保护的加拿大制造业部门,在产出及生产率方面都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同时价格也出现大幅下降,“国家方针”所涉及的产业表现出更大的规模收益特征及更快的学习速率。上述文献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不过也有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有学者发现日本棉纺织产业自19世纪后期建立以来,经历三十余年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棉纺织产品供给方,而日本政府对于棉纺织产业的帮助仅限于最

初支持了几家企业的创建，再考虑到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日本在欧美列强的要求下实施低关税政策，这似乎表明自由而非保护可能更利于幼稚产业的发展 (Ohyama, Braguinsky, and Murphy, 2004)。他们的研究未否定幼稚产业保护论，而是提出了一个包含企业家才能与知识质量的新模型框架，知识的质量而非规模才是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高质量知识的获取需要由高能力的企业家实现；对幼稚产业实施保护的代价，就是由于对竞争的规避，使得市场选择的企业家能力均值较低，从而并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三、现代幼稚产业论的实践：进口替代战略

现代幼稚产业保护论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政策实践就是进口替代战略。二战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开启工业化进程，落实到政策实践上就是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产业，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实施高关税、进口配额、本土成分要求和对本土企业激励与补贴等。幼稚产业甚至被泛化为幼稚经济，即被认为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会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外部效应，保护范围甚至扩展到整个工业部门。要说明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并非发展经济学理论推进的结果，政策实践要早于理论研究。拉美地区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受来自欧美的制成品进口锐减的影响，本土工业出现了较快发展，劳尔·普雷维什 (Raúl Prebisch) 等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在总结拉美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战略，进口替代概念作为战略的内容构成才开始出现。

普雷维什和贡纳尔·缪尔达尔 (K. Gunnar Myrdal) 是对进口替代战略进行了长期研究的重要经济学者。普雷维什提出的核心理论是所谓的中心外围论，中心是指发达工业化国家，而外围则是指欠发达经济体。普雷维什从技术进步角度讨论了中心外围问题，他认为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要快于初级产品部门，但工业部门明显地集中于中心国家，外围经济体中则是初级产品部门占主体。普雷维什 (Prebisch, 1950: 8) 指出，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中心国家的工业部门，这种技术及保护并没有直接传播到外围国家，这导致中心外围发展的极不平衡。在联合国报告中，普雷维什 (Prebisch, 1954: 66) 指出在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背景下，贸易保护而非传统理论所主张的贸易自由化下的国际分工，对于外围国家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的说法，保护不是额外

的短期需要，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长期必要。普雷维什（2015：217）同样指出，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在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充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这就是进口替代原则。缪尔达尔（Myrdal，1968：1185）针对南亚欠发达国家指出，长期来看这些国家要获得显著发展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的现代工业部门能够吸纳更大比例的劳动力。缪尔达尔（Myrdal，1957：52）明确地指出，贸易本身并不会带来经济发展，更自由的贸易甚至有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永久的停滞。在阐述对进口加以限制的理由时，缪尔达尔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外汇缺口约束（Myrdal，1968：999），即工业化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资本装备，外汇缺口的压力使得限制进口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其他的理由包括促进创造外部经济的个人投资、消除不利于工业部门的价格结构等（Myrdal，1956：279）。缪尔达尔指出，进口替代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前景（Myrdal，1968：1230）。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实践源自20世纪30年代，在实践初期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快速增长，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幅提高，制造业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高于经济增长率，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苏振兴、张勇，201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普遍停滞，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并没有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工业化目标并未实现。以巴西微型计算机产业为例，巴西自1977年开始实施针对信息企业的保护政策，目标是实现相关领域的技术独立，保护程度高到基本将国外企业排除出巴西市场，保护范围则逐步涵盖了从微机到数据处理设备的广泛内容。Luzio and Greenstein（1995）基于详细的微机产品价格及性能数据以及标准的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ethod），对保护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巴西计算机产业虽然实现了相对较高的技术进步速度，但比较来看还是低于国际竞争对手的进步速度，巴西的技术前沿通常落后于国际市场，类似型号计算机产品的本土售价比国际市场价格高70%至100%，进一步测算发现因保护而损失的消费者剩余约是国内计算机消费支出的20%。根据穆勒标准，成功的保护政策应该提高幼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巴西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成功。

针对进口替代战略的困境，相关文献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普遍遇到外汇缺口。进口替代产业的扩张需要进口配套原料、中间产品、机器设备等，为促进这些产品的进口，相关经

济体往往会故意高估汇率，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出口和外汇收入。在外汇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外汇支出需求反而增长，外汇缺口最终制约了政策效应的发挥。事实上，缪尔达尔和普雷维什都指出了出口对于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出口为资本品进口提供了支持，出口对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Myrdal, 1956: 276; Prebisch, 1961a, 1961b）。其次是进口替代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门槛效应。进口替代往往从日常消费品开始，这一过程完成之后，接下来要推动重工业的进口替代。但进入下一阶段并非自发实现的，新阶段需要进口替代的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需要更多的投资及应用更为复杂的技术，但无论是出口收入还是外资流入，都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本供给（Prebisch, 1959a; 1959b: 143）。而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相对有限，不足以支撑重工业实现规模经济，很难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此外，还要考虑到进口替代战略采用的复杂举措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外汇使用权、进口配额、补贴和行业进入许可，这些政策工具都涉及繁琐的行政程序，往往为寻租留下了空间。从进口管制中获益的企业，并不会重视质量控制、管理水平提升及降低成本，也不会和技术知识获取方面进行更多投资，反而会努力寻求对行政部门的俘获以加强其垄断地位。这在扭曲要素配置结构的同时，也导致保护性政策无法及时退出，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及产业格局固化。Singer（1953, 1958）就指出保护性关税有可能将欠发达国家束缚于高成本项目上，这些项目持续汲取国家资源，阻碍社会发展。Tornell（1991）提出了保护性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最优的保护性政策应该是短期的，政府应明确表明在一定时期后将退出保护，但保护期内企业如果未进行足够的降低成本的投资，在项目结束时，政府又不得不延续保护性政策。

结合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关讨论，不难发现拉美进口替代实践与美国历史经验的反差，恰好为理解各种理论的发展阶段适应性问题提供了佐证。美国实施进口保护主要是内战之后的近四十年，这些措施起到了促进相关幼稚产业快速发展的作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美国，逐步走上了推动自由贸易的道路；通过贸易开放来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更多的贸易利得，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基调。处于后发阶段，对进口限制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具有合理性，而一旦越过了这一阶段，自由贸易理论则应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李斯特和穆勒加以强调的。对比来看，拉美经济体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困境，则恰是理论的发展阶段适应性问题的反面印证。拉美

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很多，但至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产业获得发展之后，在新的阶段下并没有采用相适应的贸易政策，对于幼稚产业暂时的保护最终变成了持久的保护。正如 Singer (1989) 的总结：进口替代对于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国家、特定部门是正确的，但其他条件则可能就不是正确的。

四、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知识生产的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口替代战略逐渐被抛弃。前述针对贸易政策导向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讨论，本质上还是围绕着国家竞争主题。无论是幼稚产业保护论，还是作为其现代实践的进口替代战略，核心要义都是在于讨论后发经济体如何在国家竞争中实现赶超。然而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式微，以经济赶超及国家竞争为核心的讨论也逐渐淡出了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受经济学主流范式调整的影响，更加偏向于数理推导的理论研究，对国家竞争因素强调得越来越少，为了分析的便利而更加集中于纯粹经济关系的讨论，通用型的数理模型取代了多元化主体的发展模型。

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最为重要的通用型理论模型突破，内生增长理论为贸易政策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哈罗德 - 多马模型，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 (Robert M. Solow) 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成为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主导框架。然而此后主流经济学对增长理论的研究兴趣逐渐消散，这主要是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为随机外生变量，由技术进步决定的长期增长率因而也必然是外生的，对于外生因素决定的变量，政策分析显然是无意义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将外生技术进步转变为内生变量，假设技术进步与投入知识生产的资源成正比，在此框架下政策将能够对技术进步产生作用。内生增长理论大致被划分为两代，第一代主要是指 Romer (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ghion and Howitt (1992) 等提出的理论模型，其中都设置了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发部门，通过研发活动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Romer (1990) 将创新类型设定为创造更多品种的中间产品，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ghion and Howitt (1992) 将创新类型设定为产品质量提升及成本降低。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则主要是对研发活动特性做了进一步设定以解决“规模效应”问题，例如，Jones (1995) 假定研发活动具有弱知识外溢效应，既有知识存量对新

知识创造并不会产生同等效应；Kortum（1997）假定研发构建了最优技能形成的技术前沿，但随着技术前沿的推进，实现对前沿的突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Segerstrom（1998）假定了研发难度递增等。

内生增长理论从知识生产视角，为讨论贸易政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将从事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研发活动内生化的，因而针对贸易政策的讨论就可以聚焦在其对研发的影响上。有学者最早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框架讨论了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对于进入衰退期的产业进行贸易保护，将会提高受保护产业的劳动要素需求，在劳动禀赋固定的条件下，用于研发的劳动要素就要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劳动需求增加导致工资及生产成本上升，这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激励（Segerstrom, Anant, and Dinopoulos, 1990）。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通过构建包含两个完全对称经济体的模型，分析了贸易限制对于研发及创新的影响。模型中的国内研发者具有两种选择：设计新产品或者复制国外产品，后者的成本显然更低。贸易开放时，企业只能通过创新来获得垄断利润，而在限制进口、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研发者更愿意进行复制。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根本，资源被转移至复制这种缺乏创新力的冗余活动，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的滞后。与之类似，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也通过构建对称经济体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两国同时降低关税壁垒情况下的技术进步。模型假定生产和研发活动中需要使用到非技能和技能劳动，但研发的技能密集性更高，技能的获取具有内生性，劳动者将选择是否在技能培训方面花费时间。理论推导显示，贸易开放提高了研发活动的收益，将促进产业结构由生产向研发的调整，也将通过提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水平，推动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提高自身技能水平，这些都推动了创新与技术进步。不过，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分析的是双边同时降低关税壁垒的情况，本国研发活动收益的增加实际来自外国的市场开放，至于本国单边的进口开放是否产生同样效应则并未加以讨论。应该说，这些文献的讨论为理解进口开放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但模型严格的假设条件，加之被简洁化处理的研发活动在现实中却具有复杂特性，如知识生产的随机性、生产过程的黑箱特征，这些都导致难以从实证角度为上述分析提供进一步的论据支持。

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研发活动，除了需要投入劳动与资本要素外，还假定了已有知识存量的扩充将加速创新。国际贸易不仅仅是商品流通，这一过程

同时也促进了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这对于缩短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与升级至为关键。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要实现从落后技术向前沿技术的跃进，贸易自由化及进口限制的取消将发挥重要的作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149) 系统地考察了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其中特别讨论了知识溢出效应。他们指出，一国加入世界经济体之后，能够接触国际贸易所积累起的巨大知识宝库，也能够更快地接触国际最新发明；如果一国居民和外国居民有了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就有可能学习到新知识；在商业领域，经济一体化使得在世界市场上做生意的国家，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以及生产新产品的新技术。这些新知识的溢出效应，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将发挥重要作用。Rivera-Batiz and Romer (1991b) 特别强调了新创意思想流动与产品流动的重大区别，仅存在产品流动的贸易开放对长期增长并不会产生影响，而一旦同时包含了产品及新创意思想的流动，新创意思想集的扩大将提高研发生产率，进而推动创新及技术进步。Feenstra (1996) 指出内生增长模型所得出的国家间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收敛的结论，实际上源自这些模型中隐含的假设，即国际贸易与知识的溢出同时发生，贸易所带动的知识溢出促进了落后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并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收敛；相反，不存在知识溢出条件下的贸易开放将会导致增长率的分化。

相对于贸易开放对研发的影响，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所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要更具可行性，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之后，大量文献就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Coe and Helpman (1995) 最早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员国之间的技术溢出，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国际溢出效应。尽管 Keller (1998) 和 Lichtenberg and Potterie (1998) 指出，Coe and Helpman (1995) 的实证环节存在问题，但调整后的分析仍发现贸易在促进技术外溢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样本，戴维·科 (David Coe) 等进一步采用 1971—1990 年 77 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进口包含了国外知识的中间投入品及资本设备，显著提高了发展中

^① 上述结论在针对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实证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例如 Eaton and Kortum (1999); Xu and Wang (1999); Keller (2002); Fracasso and Marzetti (2015)。

经济体的生产率，平均而言，工业化经济体研发资本存量增长1%，将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0.06%（Coe, Helpman, and Hoffmaister, 1997）。塔明·巴约米（Tamin Bayoumi）等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国计量经济模型（MULTIMOD）的分析显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的进口开放政策显著促进了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这些经济体在近二十年所实现的经济成就及生产率增长，应部分归因于贸易引致的国际研发溢出效应（Bayoumi, Coe, and Helpman, 1999）。

内生增长理论为理解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在此之前，技术是难以被深入分析的外生性因素，因而讨论贸易政策对技术进步、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就无从入手。借助于可内生化处理的技术因素，可以发现进口限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客观上降低了创新激励及技术进步，更是阻碍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境流动，这些都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负向影响。内生增长理论由此也形成了更加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主张。斯密和李嘉图的分析聚焦于贸易的静态收益，内生增长理论则从长期收益的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理论。这是否意味着此前围绕理论的发展阶段适用性的讨论不再适用，而是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及政策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讨论基本采用了对称性的模型框架，并且设定了单独研发部门，这实际上已经假定了经济体达到知识生产与分工的较高发展阶段，这些讨论对落后经济体的适用性是存有疑问的。即便对于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信息和知识跨境溢出，这充其量只是构成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是获得知识溢出的前提。对于后发经济体，从工业化进程起步到构建出一定的产业基础，这中间仍然需要进口限制与贸易保护。应该说，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的分析，更多是为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进一步推进贸易开放提供了新论据，这与此前关于各种理论的阶段适用性的讨论并不矛盾。

五、现代贸易理论的梳理：异质性视角的突破

20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要素禀赋论、不完全竞争贸易论与异质性企业贸易论，构成了三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伊莱·赫克歇尔

(Eli F. Heckscher) 与贝蒂·俄林 (Bertil Ohlin)^① 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 贸易结构由要素禀赋决定, 贸易自由化将推动各经济体专业化于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业。后发经济体在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方面相对稀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 贸易自由化将使其产业结构更加与现代产业发展方向背离。对于落后经济体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俄林持有与李斯特、穆勒相似的观点, 即需要在特定阶段采取进口限制的保护性政策。俄林 (2008: 236—238) 指出, “关税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状况”, “关税保护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所谓的技术劳动力或有组织能力的劳动力的供给上”; 新兴国家如果对于制造业实施保护, 将会提高对制造业工人的需求及相应报酬, 工人得到技术训练的机会也会增多, 技术工人的数量可能大大增加; “在一定条件下, 关税保护是一种教育方法。尽管生产力可能误用, 但与其所得相比还是值得的”。俄林 (2008: 238) 还特别指出关税保护的有效作用要受制于发展阶段, “工业发展越原始, 保护对劳动力的素质的成效就越大”, “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已经度过了‘幼稚’阶段, 那么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机会就很少, 尤其是技术工人的供给增加会比较少”。保罗·克鲁格曼 (Paul R. Krugma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它从规模经济的角度为产业内贸易提供了理论解释, 然而它并没有为讨论产业升级问题提供空间。贸易自由化尽管将提高企业产出规模、降低生产成本, 但均衡状态下企业的空间分布取决于偶然因素, 这就很难去找寻其政策含义。

代表性企业的假设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的习惯做法, 这有利于模型简化分析。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大量微观企业数据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企业间存在显著异质性。^② 同一个细分行业内的企业在规模、生产率、投入要素构成、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出口企业往往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但它们通常比不出口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水平也更高。理论上需要为这种异质性寻找新的解释框架, Melitz (2003) 提出了基于垄断竞争结构的理论模型, 该模型兼具一般性与灵活性特

① 亦有译为伯特尔·俄林。

② 相关研究如 Bernard, Jensen, and Lawrence (1995); Bernard and Jensen (1999); Bernard et al. (2003); Helpman (2011)。

征，逐步成为解释企业异质性的基本框架，也为理解进口开放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Melitz (2003) 模型假定企业进入特定产业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进入成本，如创建品牌、研发生产技术等，生产率水平是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只能在支付进入成本之后才能获知自己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只能根据进入后的预期利润来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对于进入市场的企业，如果选择将部分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则还需要支付额外的出口固定成本以及由运费、保险费、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所构成的可变成本。

在这些假定条件下，Melitz (2003) 通过对模型的推导得出以下结论，即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利润、行为和经营策略的核心变量，最终的稳定状态会形成两个生产率临界值，一个是相对较低的决定是否进入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另一个是相对较高的决定是否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两个临界值将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生产率水平低于市场进入临界值的企业，这部分企业生产率水平较低，利润不足以弥补支付的进入成本，故退出市场；第二类是高于市场进入临界值低于出口临界值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将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第三类是高于出口临界值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将进入出口市场。Melitz (2003) 发现出口壁垒的减少会降低出口可变成本，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会相应降低，更多的企业也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出口企业的增加提高了对国内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素价格上升导致了市场进入临界值提高，因而低生产率企业会退出市场。类似地，进口开放将减少对国内企业的产品需求，进而减少后者的利润水平并提高市场进入的生产率临界值，最终促使部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结果就是产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产业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除此之外，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相关研究还考虑了进口的竞争效应。不少文献提到了进口开放所带来的竞争效应能够限制垄断厂商的市场权力、重构市场结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 X 非效率 (X-inefficiency) 及寻租行为等，进而有利于推动产业生产率水平及竞争能力的提升。^① 不过，这些论断的理论基础实际上非常薄弱，缺少清晰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在异质性企业的设定基础上，通过引入与 Melitz (2003) 不同的偏好及需求函数，为进口开放的竞争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解释。Melitz

① 相关讨论如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Krueger (1991: 27—58); Dornbusch (1992)。

and Ottaviano (2008) 得出了与 Melitz (2003) 同样的结论, 即贸易自由化会促使最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进而提高产业的平均生产率, 但其中的作用机制则完全不同。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指出进口开放会提升国内的竞争强度, 提高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 降低代表市场势力的加成率, 进而导致最低效企业的退出以及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从生产率异质性角度, 为进口开放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及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解释, 实证层面上, 一大批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成果也为相关论断提供了经验支撑。例如, Pavcnik (2002) 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智利贸易自由化转型时期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贸易开放使进口竞争行业的总体生产率水平提高了 31.9%, 而非贸易部门仅增长了 6%, 贸易开放推动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再配置是推动进口竞争行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机制。Trefler (2004) 基于加拿大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加拿大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7.4%, 而进口开放度最高行业的生产率更是提升了约 14%,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主要是得益于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以及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重新配置。Amiti and Konings (2007) 针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进口投入品及最终产品关税下降 10%, 分别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12% 和 6%。Bustos (2011) 基于巴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加入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自贸协定的背景, 就进口开放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结果显示进口关税的降低提高了企业在技术使用方面的投资, 而且这种正向效应在关税下降更多的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Topalova and Khandelwal (2011) 基于印度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数据考察了当时的贸易政策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进口关税下降 10% 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增长约 0.5%。

从生产率调整及产业内资源再配置的角度, 异质性企业理论为理解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相关政策主张同样是贸易自由化。如果把生产率水平提升宽泛地理解为技术进步, 围绕异质性企业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线实际上是一致的。尽管两种理论在分属领域属于重大的理论突破, 但就讨论进口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而言, 两条主线的分析具有重合性。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基于这两种理论的讨论都是从技术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利得分析。异质性企业理论设定的代表性经济体模型并

没有涉及发展阶段的问题，但实际上已经假定了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这一点与内生增长理论也具有相似性。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给出一定篇幅对国际政策博弈视角下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补充说明。通过检索与查阅国际贸易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各个时期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基本是围绕出口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及福利提升的效应进行讨论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政策主张，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经济史来看，开放的贸易体系并非常态化事实，如何打开出口市场、扩大出口规模对于很多经济体而言都是政策难题。更糟糕的情况是，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灾难性贸易政策实践并非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关税战。打开出口市场的关键在于利益对等，在寻求出口市场开放的同时，也要实现国内市场的开放。以进口市场开放来促进出口市场开放，即所谓市场准入互换（exchange of market access），这也是进口开放推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间接渠道。

英国古典经济学者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对最优关税及贸易条件等进行讨论时，就提到了贸易互惠的问题。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在拓展世界市场时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国家对英国实施以阻止其货物进入为目的的敌对性关税（hostile tariff），导致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过剩。1844年托伦斯（Torrens, 1970: 47—48）在《商业和殖民政策的预算》一书中指出单边关税导致关税实施国家对关税作用对象国的需求减少，具体就是指当时针对英国实施敌对性关税的国家恶化了英国的贸易状况。对此，托伦斯提出了商业互惠的原则，对于以低关税接收英国产品的国家，英国给予同样的低关税，对于面向英国商品征收高关税或者禁止性关税的国家，则应给予同样的高关税或禁止性关税。不过，实践中上述策略并没有为英国所采用，英国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发动殖民地战争。在与托伦斯上述文献基本同时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1961: 273）指出以关税互惠为依据的商业条约，如果缔约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相互开放市场对于后发经济体就是不值得的。李斯特列举了葡萄牙与英国签订的《麦修恩条约》、法国与英国签订的《伊甸条约》，这些条约造成的后果就是葡萄牙和法国把它们在工业上已有的成就以及将来可望获得的成就一并放弃。普雷维什（2015: 219、218）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也指出：“互惠性只有在国家之间实现了技术的某种均质性并在其中某些国家不存在持续的失业现象时

才能行得通”；“中心国家越是对来自外围的进口放宽限制，……对原有的替代性工业来说，取消保护将意味着走回头路”；“应当了解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含义，从而就会发现，互惠性可能恰恰是事与愿违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阿里耶·希尔曼（Arye L. Hillman）等为这种对等自由化（reciprocal liberalization）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Hillman, Long, and Moser, 1995）。如果两个经济体互相开放市场，那么两国将同时实现收入向出口部门的转移，两国政府都将在此过程中获得出口部门的政治支持，从而有利于抵消来自进口竞争部门的反对压力。相反，如果在不开放本国市场的条件下只寻求外国市场的单边开放，那么外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外国在进口竞争部门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出口部门却无法获得利益，这种双重政治压力决定了外国政府不会单边开放其国内市场。Hillman and Moser（1996：295—312）进一步指出这种互惠性质的对等自由化程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在政治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最优的双边贸易开放并不必然需要消除所有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受财政制约的情况下，对等自由化将是逐步推进的过程。尽管理论探讨相对有限，但在以进口开放换取出口市场的实践中却并不鲜见。例如，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其外交工作的长期重心都在于寻求主要经济体对美国开放市场，核心举措就是以开放美国市场来换取国外市场。在1815年通过的互惠法案中，美国明确表明了以互惠、对等的原则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设想。二战后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实际上也是对等自由化及市场互换思想的体现，其核心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为了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市场开放承诺的可信度，从而增强缔约方的信心及开放意愿。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面临多重困境、多边谈判举步维艰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双边及区域自贸协定不断涌现，本质上还是欲借助自贸协定中的约束机制确保市场开放的可信度，实现市场互换，以进口开放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六、结束语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构成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理，然而围绕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主张，学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针

对进口贸易政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就各思想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古典经济学时期，比较优势理论一经提出，李斯特、穆勒等学者就指出了理论的缺陷，即斯密、李嘉图等人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立场将比较优势视为静态禀赋。李斯特、穆勒等更加强调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属性，指出后发经济体应实行贸易保护促进工业发展及比较优势的形成。在发展经济学框架下，贸易自由化被普遍认为对落后经济体的发展并不利，要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发展初始阶段实施进口限制与贸易保护是必要的，这构成了现代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主要议题。内生增长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从知识生产及生产率的角度，就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这两条主线的分析客观上具有重合性。除此之外，国际政策博弈与市场互惠，也为理解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提供了间接思路。

围绕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思想史考察，揭示了现实问题的复杂特性，如果不考虑具体所处的发展阶段，机械地谈论某种“共识”是不具说服力的。总体上看，各学说流派似乎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观点，但这种差异在本质上更多还是围绕各种理论的阶段适应性所展开的争论。斯密和李嘉图讨论的是贸易利得问题，而李斯特、穆勒讨论的则更多是发展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以及现代幼稚产业保护论强调了后发经济体在发展初期的困境，提出在此发展阶段下的贸易保护理论及政策主张。通过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创造出产业发展所需条件，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制造出比较优势，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格局，使其在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李斯特并没有否定越过发展初期后比较优势理论的价值及适用性，对于越过了特定发展阶段的工业化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将表现出更好的适合性。拉美进口替代政策实践与美国历史经验的反差，为认识与理解理论的阶段适应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实证证据。类似地，基于内生技术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及政策主张也并不能否定幼稚产业保护论，这两种理论在模型设定中实际上暗含了产业已经越过发展初期阶段的假设，更多是为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推进贸易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试想如果未经过发展初期阶段并建立起工业体系，将如何实现研发专门化、技术溢出的吸收以及产业内的资源再配置。

回过头来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基于不同的立场而提出不同

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这充分体现了国际贸易研究中隐秘的政治用意。如何看待众多的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取决于分析者的立场站位。基于发达国家立场，自然的选择是对进口限制持批判态度，而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以经济追赶和发展为目标构建贸易理论才是必然的选择。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很难说存在某种完美的通用型理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偏离自身国情而盲目遵循基于发达经济体立场所演绎出的理论政策，只会使自身更深地陷入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去。^①就中国经济而言，近年来中国外向型经济政策出现明显调整，进口开放度大幅提升，这并不是否定此前进口开放度相对较低的政策安排，而是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采用的是高度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采用的仍然是有选择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的进口开放度都是相对较低的。然而这种进口限制政策却推动了完整工业体系及经济基础实力的构建，也为后续逐步推动开放的深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提供了支撑条件。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时，则更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获得各种静态和动态贸易利得，这才决定了主动扩大进口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贸政策的主基调。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这势必要求学界围绕进口开放与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俄林，伯特尔，2008，《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逮宇铎、苏振东、李秉强译，华夏出版社。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965，《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196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
- 刘易斯，阿瑟，1983，《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卡尔，1963，《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卡尔，1972，《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2009，《政治经济学原理》（下），金镛、金熠译，华夏出版社。

^① 感谢审稿人在此所指出的思路方向以及对于重要观点内容的凝练。

- 普雷维什, 劳尔, 2015, 《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 苏振兴、袁兴昌译, 商务印书馆。
- 斯密, 亚当, 197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 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 苏振兴、张勇, 2011, 《拉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 《拉丁美洲研究》第 5 期。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2): 323 - 351.
- Amiti, Mary, and Jozef Konings.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5): 1611 - 1638.
- Bayoumi, Tamin, David T. Coe, and Elhanan Helpman. 1999. "R&D Spillovers and Global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7 (2): 399 - 428.
- Bernard, Andrew B., and J. Bradford Jensen. 1999.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7 (1): 1 - 25.
- Bernard, Andrew B., J. Bradford Jensen, and Robert Z. Lawrence. 1995. "Exporters, Jobs, and Wages in U. S. Manufacturing: 1976 - 1987."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1995: 67 - 119.
- Bernard, Andrew B., Jonathan Eaton, J. Bradford Jensen, and Samuel Kortum.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4): 1268 - 1290.
- Bond, Eric W. 1993.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for Protection." In *Theory, Policy and Dynamic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nald W. Jones*, edited by Wilfred J. Ethier, Elhanan Helpman, and J. Peter Neary, pp. 191 - 212. Cambridge, U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stos, Paula. 2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s,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ERCOSUR on Argentinian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 304 - 340.
- Coe, David T., and Elhanan Helpman. 1995.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859 - 887.
- Coe, David T., Elhanan Helpman, and Alexander W. Hoffmaister. 1997. "North-South R&D Spillover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 (440): 134 - 149.
- Corden, W. Max. 1971. *The Theory of Prot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rden, W. Max. 1974.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Welfa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inopoulos, Elias, and Paul Segerstrom. 1999. "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Protection and Relative Wa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3): 450 - 472.
- Dornbusch, Rudiger. 1992. "The Case for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 (1): 69 - 85.

- Eaton, Jonathan, and Samuel Kortum. 1999.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ory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0 (3): 537–570.
- Feenstra, Robert C. 1996. "Trade and Uneven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 (1): 229–256.
- Flam, Harry, and Robert W. Staiger. 1991. "Adverse Selection in Credit Markets and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 edited by Elhanan Helpman, and Assaf Razin, pp. 96–117.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Fracasso, Andrea, and Giuseppe Vittucci Marzetti. 2015.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D Spillov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6 (1): 138–149.
-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 Grossman, Gene M., and Henrik Horn. 1988. "Infant-Industry Protection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Informational Barriers to Ent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 (4): 767–788.
- Harris, Richard, Ian Keay, and Frank Lewis. 2015. "Protecting Infant Industries: Canadian Manufacturing and the National Policy, 1870–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6: 15–31.
- Head, Keith. 1994.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in the Steel Rail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7 (3–4): 141–165.
- Helpman, Elhanan. 2011.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R. 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Hillman, Arye L., and Peter Moser. 1996. "Trade Liberalization as Politically Optimal Exchange of Market Access." In *The New Transatlantic Economy*, edited by Matthew B. Canzoneri, Wilfred J. Ethier, and Vittorio Grilli, pp. 295–31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llman, Arye L., Ngo Van Long, and Peter Moser. 1995. "Modelling Reciprocal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Political-economy and National-welfare Perspectives." *Swis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31 (3): 503–515.
- Irwin, Douglas A. 2000. "Did Late-Nineteenth-Century U. S. Tariffs Promote Infant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the Tinplate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 335–360.
- Jones, Charles I. 1995. "R&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4): 759–784.
- Keller, Wolfgang. 1998. "Ar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Trade-related? Analyzing Spillovers

- among Randomly Matched Trade Partn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2 (8): 1469 – 1481.
- Keller, Wolfgang. 2002.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1): 120 – 142.
- Kortum, Samuel S. 1997. “Research, Patenting,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etrica* 65 (6): 1389 – 1419.
- Krueger, Anne O. 1991.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iberalization.” In *Liber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Lawrence B. Krause, and Kim Kihwan, pp. 27 – 5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chtenberg, Frank R., and Bruno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1998.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 Com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2 (8): 1483 – 1491.
- Luzio, Eduardo, and Shane Greenstein. 1995.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Protected Infant Industry: The Case of Brazilian Microcomput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7 (4): 622 – 633.
- Melitz, Marc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1695 – 1725.
- Melitz, Marc J., and Giancarlo I. P. Ottaviano.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 (1): 295 – 316.
- Myrdal, Gunnar. 1956.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 Myrdal, Gunnar.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 Myrdal, Gunnar. 1968.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Vol. 2*.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Ohyama, Atsushi, Serguey Braguinsky, and Kevin M. Murphy. 2004.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Market Selection in an Infant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7 (2): 354 – 381.
- Pavenik, Nina. 2002. “Trade Liberalization, Exit,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Chilean Plan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1): 245 – 276.
- Prebisch, Raúl.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 Prebisch, Raúl. 1954.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Polic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Prebisch, Raúl. 1959a.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49 (2): 251 – 273.

- Prebisch, Raúl. 1959b. "Statement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Study the Formulation of New Measure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Common Market*,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pp. 141 - 14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 Prebisch, Raúl. 1961a.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Latin American Progress." *Foreign Affairs* 39 (4): 622 - 633.
- Prebisch, Raúl. 1961b.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Monetary Stability: The False Dilemm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6 (1): 1 - 25.
- Rivera-Batiz, Luis A., and Paul M. Romer. 1991a.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5: 971 - 1001.
- Rivera-Batiz, Luis A., and Paul M. Romer. 1991b.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531 - 555.
-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S71 - S102.
- Segerstrom, Paul S. 1998. "Endogenous 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5): 1290 - 1310.
- Segerstrom, Paul S., T. C. A. Anant, and Elias Dinopoulos. 1990. "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5): 1077 - 1091.
- Singer, H. W. 1953. "Obstacl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Research* 20 (1): 19 - 31.
- Singer, H. W. 1958. "Deficit Financing of Public Capital Form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flationary Proces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7 (3): 85 - 96.
- Singer, Hans W. 1989. "Lessons of Post-War Development Experience: 1945 - 1988."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1 (2): 1 - 29.
- Topalova, Petia, and Amit Khandelwal. 2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nd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3): 995 - 1009.
- Tornell, Aaron. 1991. "Time Inconsistency of Protectionist Progra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3): 963 - 974.
- Torrens, Robert. 1970. *The Budget on Commercial and Colonial Polic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 Trefler, Daniel. 2004. "The Long and Short of the Canada-U. S.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4): 870 - 895.
- Xu, Bin, and Jianmao Wang. 1999. "Capital Goods Trade and R&D Spillovers in the OECD."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5): 1258 - 1274.

Import Liber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Shao Jun^a and Si Zengchuo^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a;
Business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b)

Abstract: The debate over import liberalization has never ceased in economics. Once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was put forward, scholars such as List and Mill pointed out the limits of Smith and Ricardo's position in developed industrial economies. Fro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y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import liberalization is harm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nations.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reat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ectors, import restrictions are necessary. However,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heterogeneous firms trade theory since the 1990s have provided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mport liberalization. The different views of various schools are not in conflict, but actually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bat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rgely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and trade policy orient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Debate over import liber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factors of development stage, is hard to reach a consensus.

Keywords: Import Liberal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JEL Classification: F13, O14, O24

(责任编辑：倪诗妆)